

欧亚备要

汤开建 著

党项西夏史探微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党项西夏史探微

汤开建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党项西夏史探微 / 汤开建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欧亚备要)

ISBN 978-7-100-10459-3

I. ①党… II. ①汤… III. ①羌(古族名)—民族历史—中国—文集②中国历史—西夏—文集 IV. ①K289-53
②K246.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7712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党项西夏史探微

汤开建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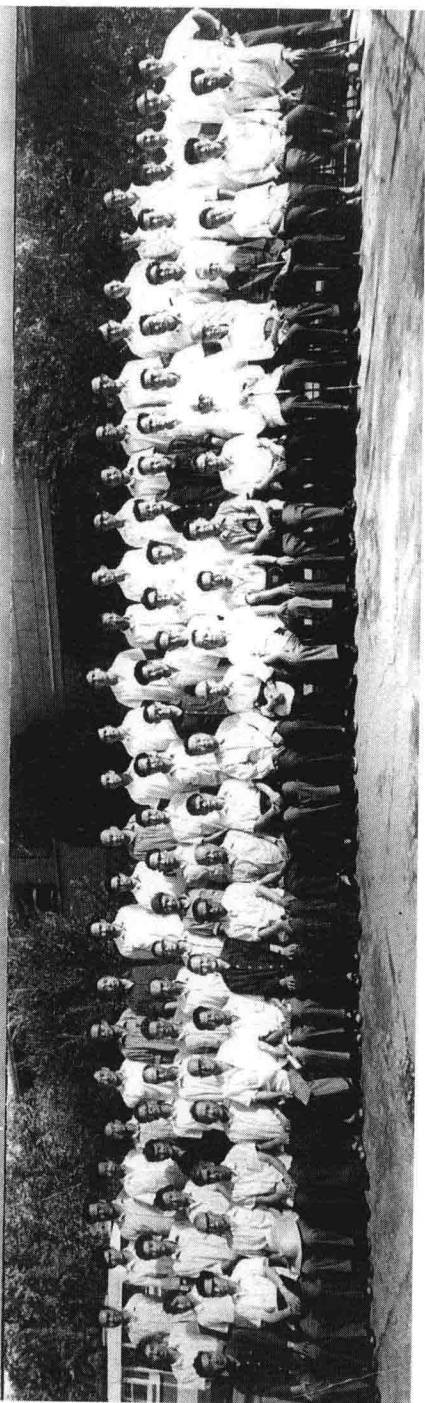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10459-3

2013年12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6 1/4

定价: 126.00元

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首届

一九八一年八月银川



1981年中国第一届西夏研究学术会在银川召开，后排左起第13人为作者

简体版前言

《党项西夏史探微》于2005年经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启庆先生推荐，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海外汉学界。正如原书推介者所言：该书收录作者二十余年来研究党项西夏论文二十余篇，针对党项源流、党项部落分布与迁徙、党项姓氏、党项风俗、西夏军事制度、宋夏战争、金夏关系、西夏文化及元代西夏遗民诸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考证与论述。本书最大的特点，即是史料搜集极为繁富齐全，包括正史、杂史、方志、笔记、文集、小说、金石、类书、画谱及各种已翻译的藏文、蒙文、突厥文、回纥文、西夏文资料，特别是对党项西夏史考古材料的搜集与使用。可以说，宋元明清以降有关党项西夏史料基本网罗殆尽。作者在此基础上展开他的党项西夏史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观点，为学界党项西夏史的研究开启了新方向。

然而，此书出版数年以来，内地研治西夏史、民族史学者多未见到此书，纷纷来函向余索求，而允晨文化出版公司亦称销售已罄。今蒙我国著名中亚史、西北史专家余太山教授相邀，决定在国内出简体字版，本人不胜感激，遂请人重新打字录入，并花数月时间校对。这一次出版，除个别文字修订及史料出处补齐外，又对其中部分内容增补了不少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最新的西夏文翻译资料及新寻觅的方志资料，还在版本、注释的校对中耗去不少精力，总之，简体字版不论是内容还是注释校勘又胜台湾版一筹。余以为，《党项西夏史探微》在内地的出版发行，势必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不仅对党项西夏史研究将会有所推进，而且对目前尚方兴未艾的“西夏学”亦应有所裨益。余今日学术研究的重点虽然不在“西夏学”，但并不等于某些人就可以将余之西夏研究成就完全漠然置之，或讳莫如深。中国学术有很多恶

劣之风，前辈人辛辛苦苦从浩瀚的文献中挖掘出新史料，做出了新研究，有的后来者全盘接过，转换文字，有的则是全盘抄录，间作修补，即为己有，全然不提前人之存在，甚至连名字也不愿提及。此风在西夏史研究中并不少见。不认真学习、总结与继承前人优秀研究成果，而是利用前人研究成果与基础搭建起自己的学术象牙之塔而反将前人“置之度外”，这就是我国学术大发展中普遍出现的“怪现状”。此风不煞，中国之学术无望；此风不正，中国之学术只能是一片混沌。

学术的发展从来就是叠罗汉似的向上攀援，任何学者的学术成就一定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高攀。余在党项西夏史研究中之所以有所发现，有所创见，就是站在王国维、顾颉刚、邓广铭、岑仲勉、王静如、石泰安、聂历山、姚薇元、陈述、杨志玖、蔡美彪、金宝祥、罗福颐、罗福苾、吴天墀、唐嘉弘、克恰诺夫、韩荫晟、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李蔚、周伟洲、耿昇、聂鸿音、陈炳应等前辈或同辈学者的肩膀上取得的。虽然，余之研究与他们不同，且经常与上述学者商榷，甚至在观点及结论上与他们截然相反，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他们在西夏学领域中的前期研究，就不可能有余后来之成就。这是学术史发展的逻辑链接，谁也无法超越。古人云：“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学界之恶风，当为明智者戒。

余治党项西夏史三十余年，其间虽有较多的时间移至南海，但对党项西夏史资料的搜集及研究从未中断，纵览以往之党项西夏史研究，一直在余脑中反复思索的问题实为一“头”一“尾”。“头”即是党项及拓跋氏的源流。对于这一问题，余确殚精竭虑，遍寻汉、藏、西夏各种考古材料，从东胡、羌藏两大民族系统的变迁着眼，指出了党项民族之本源为鲜卑，但进入羌中日久，而逐渐“羌化”。党项羌为鲜卑党项的流变，这应该是这一民族的历史事实。余几篇重头论文都是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而且为党项源出鲜卑提出一系列具有坚实史料基础的证据链，余以为，这个问题讨论到今天，余已完成了全部文献及史料的考证与诠释。既指出了称党项为“羌”的缘由，又以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考证，证出党项实出于“鲜卑”。余以为，这应是确凿无疑的结论了。但令人不解的是，学术界大多仍坚持党项源出于“羌”这种既无多少史料为证，又无法对历史文献中各种党项源出“鲜卑”史料作出正确解释的观点，实在令人茫然。是一种学术偏见？还是一种人为

的因素？难解。原本就是一个十分简单清楚的鲜卑姓“拓跋”，硬要指陈为“羌”，难道其中还有其他“奥妙”？“尾”指的就是西夏遗民，西夏遗民的资料搜集是极为困难的，可以说，元以后的汉文史籍必须全部过目，特别是地方志。此外，各种文字的考古资料不断出现，这又给资料的搜集带来更多的困难。余于1985年完成的《元代西夏人物表》，几经修订、增补，从屠寄、钱大昕的200余人，到余初稿的300余人，到现今增订到近500人，但仍有遗漏者，借今日补订之机，再稍加完善，可以反映其间的曲折艰辛。

总之，此次商务印书馆将余这部党项西夏史研究的专著在国内再版，让国内读者可以更方便地阅读到此书，亦能够对这一部著作给予准确的评判。生命有限，学海无涯，功过是非，任由评说。

湯开建

癸巳年仲春于澳门氹仔

序

西夏是中国近世史上的一个重要少数民族王朝。自元昊于公元 1038 年建国称帝，至 1227 年为蒙古所灭，立国近二百年。在当时的多元国际格局中，西夏的地位虽因时势变化而有所升沉，但始终是一实质上独立的国家，前期与北宋及辽朝相争峙，后期则与金朝及南宋相抗衡。其国祚仅略短于辽朝，而超过同时其他各国。西夏亦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全盛时代，其版图包括今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大部分、陕西北部、青海东北及内蒙古一部分。境内各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此外尚有汉族、吐蕃、回鹘、吐谷浑及鞑靼等族。西夏广泛吸收汉族、吐蕃及西域文化，创造了自身的主体文化，而在政制、法律、佛教、儒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辉煌成就。

西夏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应与辽、金二朝相当，却长期受到学者的忽视，而西夏史研究更是中国近世史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西夏史受到忽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史料的缺乏。元末右丞相脱脱修辽、宋、金三史，对三国各予正统，而以西夏为偏统，故西夏无专史，仅列入三史《夏国传》、《西夏外记》中，这些记载均甚简略，篇幅简短，不足以反映西夏历史的全貌。此后，史料大量流失，研究更难着手。

自清代中期至民国初年，有少数学者搜集排比汉文史籍中有关西夏的史料，撰为专史数种，如吴广成《西夏书事》、张鉴《西夏纪事本末》等，这些专史虽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其体例、观点往往甚为陈旧。20 世纪初年，由于西夏文文献的大量发现，国际间遂掀起一股“西夏学”的研究热潮。但是，西夏学前辈学者王静如先生以“西夏字学”一辞来称呼西夏研究，意即当时的西夏学主要是指西夏文字的研究与文献的整理，与历史研究并无直接

关系。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夏研究在中国学者间兴起第二波的热潮,这一波热潮的兴起可能由于重大考古发现及大量文献资料的出版弥补了史料不足的缺陷,为西夏研究提供较前坚实的基础,也激励了甚多中青年学者投身研究团队。西夏学研究对象,不再止于语言文字与文物考古,政治、外交、社会、经济、文化史的研究,早已开启并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

本书著者汤开建教授即为 1980 年前后投身西夏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属于“文革”后复学知青的第一代。他于 1978 年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为研究生,从李蔚教授治宋史,三年后毕业,同年调任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由于身处西北,对西北民族史产生浓厚的兴趣,而西夏史更成为他研究的重点。1986 年调任广州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在广州他的研究兴趣已有所改变,将重心转移至东南沿海。但对西夏史的研究并未停止,因而他从事西夏史研究前后已二十余年。

这本论文集是汤氏从所撰六十余篇中精选的二十一篇,分为三编:上编党项编收录论文九篇,皆是有关西夏王朝主体民族党项的族源、迁徙、姓氏、风俗之探讨,涵盖西夏建国前后党项族历史的各方面。中编西夏编收录论文八篇,重点在于西夏王朝的外交史及军事史,但亦旁及文化。下编遗民编收录论文四篇,皆有关蒙古灭夏后西夏遗民在元朝的人物、表现及相关文献。总之,这二十一篇论文,涵盖的时代甚长,不仅包括西夏本身的历史,亦探讨了其“前史”与“后史”。并牵涉到民族、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汤教授师法陈援庵(垣,1880—1971)先生。援庵先生是民国前期史科学派的大师。其治史方法最重要的两项是“竭泽而渔”的史料搜求及“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考证方法。不过,陈先生虽着重考证,却不以解决孤立之历史问题为满足,而系通过一连串疑难问题之考证,求得系统。汤教授此部论集沿袭了援庵先生考证史学的优点。

检视集中各文,正如著者自陈,“是在基本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层面上而进行的严肃学术研究”。著者之论述系以汉文史料为主要根据,除去一般西夏史研究者所着重的夏、宋、辽、金史料外,作者对元明史料、考古发现以及近代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皆极熟谙,广肆征引。在广阔的史料基础上,

著者对所处理的课题皆经过严密的考证。确实做到“不讲无证之言，不下无据之论”。

由于西夏的史料零碎而分散，著者避免谈大而无当并缺史料佐证的问题（如西夏社会性质等），而着重对个别的重要课题（大如党项族源、宋夏战争、金宋关系，小如《西夏姓氏录》考订、监军司驻所等）作出具体的探讨。但是著者并不回避主流问题，勇于针对疑难与其前辈及同辈学者作学术上的论辩，并提出令人悦服的看法。如关于党项拓跋氏的族源，过去学者或主张出于羌族，或认为源于鲜卑，本书著者则主张党项拓跋氏虽出自鲜卑，但史书中所说的“党项羌”是以鲜卑和羌人融合而成的新民族共同体。拓跋鲜卑成为新民族共同体内的统治族群，共同体内的基础则是羌人。拓跋鲜卑虽贵为统治者，在生活与文化各方面却都逐渐羌化，故史书称之为羌，而不称之为鲜卑。这一主张超越了过去的单一起源说，是一种新鲜而合理的看法。又如《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一文认为党项部落的迁徙过程，亦是民族融合的过程，“它就像滚雪球，最初的小球不过是一个纯粹羌民族共同体，不断向前滚动，越滚越大，鲜卑、突厥、吐谷浑、沙陀、吐蕃及寓居在西北地区西域诸胡的后裔都滚到这个雪球之中，经过长时期的掺和杂糅而逐渐浑然一体”，也是立足于实证之上的宏观论述。此外，关于党项姓氏及风俗、西夏军事制度、监军司、金夏关系、天文学等篇，在海内外党项西夏研究中既是最早的开路之作，采用新资料亦是最多，值得重视。

作为一个蒙元史研究者，多年以前，我阅读到本论文集遗民编中的几篇文章，即留有深刻印象。《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元代西夏人的历史贡献》都是根据大量史料对元代西夏遗民的地位及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贡献作出了公允的评估。而《元代西夏人物表》则是将现存史料中元代西夏遗民的事迹列表呈现。在我看来，本书著者不仅是西夏遗民史研究的开拓者，而且所臻水平已高，其对元代史事与史料之熟谙不亚于元史学者。这几篇论文固为其西夏史研究的延伸，对元史研究亦具有甚大参考价值。

集中诸文大多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但著者已作过重大修正，并且纳入新发现的史料（如2001年出版的元季西夏遗民杨崇喜《述善集》），因而并无过时之虞。

总之，披阅汤著《党项西夏史探微》，所得印象为一学风谨严、取材广

阔而又富有创见之论文集。著者虽谦称本书为《探微》，实际含有不少宏观的见解。在 80 年代以来中国出版的有关西夏的众多著作中，本书无疑为一优秀论著，不仅对西夏本身的历史及其前史和后史之了解皆大有裨益，而且对宋、辽、金、元学者亦颇富参考价值。基于本书的优越价值，我乐于向中外学者积极推介。

萧启庆

乙酉年春于台湾新竹

目录

上编 党项编

- 关于党项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 3
- 党项源流新证 28
- 弥罗国、弥药、河西党项及唐古诸问题考辨 69
- 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 87
- 五代辽宋时期党项部落的分布 112
- 《〈旧五代史·党项传〉族姓考》质疑 165
- 张澍《西夏姓氏录》订误 176
- 党项姓氏丛录 193
- 党项风俗述略 201

中编 西夏编

- 关于西夏军事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37
- 略论李继迁反宋战争的性质 260
- 宋仁宗时期宋夏战争述论 277
- 金夏关系述评 304
- 西夏“铁鹞子”诸问题的考释 321
- 西夏监军司驻所辨析 334
- 西夏天文学初探 359
- 党项西夏史札记 374

下编 遗民编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补释 419

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 435

元代西夏人的历史贡献 463

增订《元代西夏人物表》 4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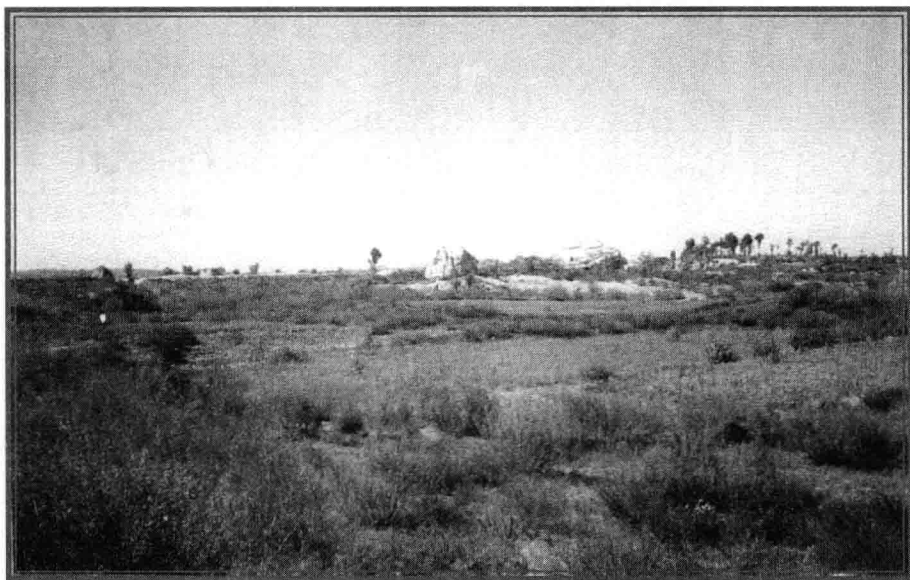
征引文献版本 511

人名部族名索引 532

后 记 562

上 编

党项编



党项拓跋部的发迹地夏州城遗址

关于党项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

关于党项拓跋氏的族源,许多专家都曾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顾颉刚、杨志玖、吴天墀、王忠、李范文、唐嘉弘诸先生和一些海外学者各就自己的意见开展过一些争论,^①分歧较大。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党项拓跋氏源出鲜卑,另一种意见认为党项拓跋氏与羌族同源,前者以吴天墀、唐嘉弘等为代表,后者则以杨志玖、李范文等为代表。时至今日,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似乎还未结束,要得出一个大家一致的结论,看来尚须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一、党项拓跋氏与拓跋鲜卑的关系

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拓跋氏与拓跋鲜卑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首先应搞清的重要问题。据西夏人自述,西夏拓跋氏源出鲜卑拓跋氏,与元魏同出,这在文献中有四条较明显的材料记载。

(一)《宋史·夏国传》载元昊上宋廷表云:

* 原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原名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收入此书时,对标题及内容略作修改。

①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杨志玖:《西夏是不是羌族》,载《历史教学》1956年第4期;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11页;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载《民族史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林旅芝:《西夏史》,香港大同印务有限公司,1975年;林瑞翰:《西夏史》,载《边疆文化论集》,台北,1953年;E. И. Кычанов: Измененный изаново утвержденный кодекс девиза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небесное процветание (1149—1169), Москва, 1988.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①

(二)《太平治迹统类》卷7《康定元昊扰边》记此表稍异：

臣祖宗后魏帝，赫连之旧国，拓跋之遗业。^②

(三)《长编》卷125宝元二年十一月夏使贺九言在赍宋嫚书中言：

元昊为众所推，盖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皇，又何不可。^③

(四)《金史·西夏传》中保留的《夏国谱系》一书的序言也称：

元魏衰微，居松州因以旧姓为拓跋氏。^④

这四条材料一致认为，党项拓跋氏是拓跋鲜卑之后，元魏的苗裔。但是，由于这些材料都出自西夏国人之口，就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分歧意见。有些学者极力否认这些材料的可靠性，他们认为，西夏拓跋氏自称是元魏的后代，这完全是“冒认”，是“高攀元魏”，目的是为他们的统治贴金，为他们的门第夸耀。^⑤有些学者却驳斥了这说法，他们认为，元昊的时代，已不是魏晋隋唐那种崇尚门阀的时代，元昊称帝自有他的实力作凭借，用不着冒认元魏王室作祖宗。^⑥

反对“高攀”说、“冒认”说的是吴天墀先生和唐嘉弘先生。他们在党项拓跋氏族源上说出许多理由，但反驳也有偏颇之处。因为，尽管元昊时

① (元)脱脱：《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7《康定元昊扰边》。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壬子条。

④ (元)脱脱：《金史》卷134《西夏传》。

⑤ 杨志玖：《西夏是不是羌族》，载《历史教学》1956年第4期；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载《民族史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⑥ 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0—11页；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